

六、从解除紧缩到神武景气

1. “数量景气”的到来

吉田内阁自道奇路线开始执行前成立以来，连续执政六年（被称为“长期政权”），但其寿命终于到了尽头。吉田内阁的方针是追随美国的占领政策及其反共的世界政策，为日本的垄断资本谋取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但是，美国在亚洲的反共战略，在朝鲜、在印度支那相继归于失败。同时在日本国内，顺从美国要求而采取的经济紧缩政策，不仅遭到国民的反对，甚至招致垄断资本的批评。开始有人认为，吉田首相的留任已经成为实现垄断资本强烈要求的保守联合的障碍。这样，吉田内阁只好总辞职了。虽然吉田首相最后向美国乞求经济援助以延长其内阁的寿命，但未成功。

当吉田内阁紧紧抓住政权挣扎图存之际，日本的景气正如前面稍许述及的那样，以出口好转为先导，于1954年9月开始逐渐回升。鸠山内阁在1954年12月成立，进入1955年后，景气回升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日本经济恰如顺风扬帆一样顺利地向前发展。

可以称为顺风的有以下两件事情。一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上升。1953年以来欧洲各国的经济节节上升，美国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于1954年秋开始恢复景气，并在这一年转为上升。还有一件是日本创纪录的大丰收，大米生产在1954年有相当数量的增加后，又于这一年取得了历史上最大的收成，产量比上年增加三成，达八千二百五十六万石^①，全部农产品增产二成以上，甚至

^① 石是日本容量单位，1石=180.5公升。——译者

超过了同年工矿业生产增长的比率。

由于海外经济上升，日本的出口大大扩大了，继上年增加三亿五千万美元之后，这年又增加了三亿八千万美元，即23%，出口总额达二十亿美元（海关统计）。上年纺织品出口显著增加，而这年钢铁出口又增加了56%，三年后便赶过棉织品，重新成为出口的第一位商品。服装、人造棉织品、玩具等消费品的出口也显著增加，船舶出口也开始大幅度增加。

与出口相比，进口增长缓慢。1955年进口额为二十四亿七千万美元，仅比上年增加七千万美元，即3%。由于国内丰收，粮食进口量减少，以及价格下跌和紧缩银根的影响，纺织原料和机械类的进口金额减少，以致整个进口额未增加。

其结果是1955年的外汇收支（国际收支）约有五亿美元的盈余，超过上年的盈余额约四亿美元，国际收支有了大幅度的改善。

另一方面，出口的增加促进了工矿业生产的扩大。这年工矿业生产指数按日历年计算增加了8.2%，从会计年度看增加了12.5%。1955年度的生产增长份额中与出口增加直接有关的占25%，如果加上出口商品的原料生产等与出口有联系的生产增加部分，则占本年度工矿业生产增加份额的五、六成。这说明此时工矿业生产的主要增长依靠海外经济上升所带来的出口增加，其次是国内消费的增长。至于设备投资，因为只比上一年度有些微增加，所以对于整个工矿业生产增长几乎没有起作用。因此生产增长主要是上述出口商品以及与出口有关的工业产品和非耐用器材，至于机械等生产资料的生产，毋宁说是处于停滞或降低的状态。

1956年度的《经济白皮书》曾就1955年度的经济举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国际收支的大幅度改善，而且国际收支的盈余与特需的金额几乎相同。因此，对日本来说，这年终于实现了没有特需

国际收支也能够平衡的多年宿愿。第二是经济的增长没有伴随通货膨胀，国民收入增加约一成(12%)。尽管经济大量增长，批发物价并未随之上涨，消费物价也始终处于停滞状态。所以这种情况被称为“数量景气”。第三是经济发展正常。战后被称为日本经济慢性病的银行超额贷款明显地改善了，用不健全的方法进行设备投资和库存投资的情况也减少了不少。

就这样，日本一方面实现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做到了国际收支大幅度改善、物价稳定，并纠正了超额贷款。这三件事同时出现，在战后还是第一次。

不伴随物价高涨的经济增长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日本无需新的大规模设备投资，利用已有设备便可以绰绰有余地扩大生产。故1953年和1954两年大型私人企业的设备投资只有一万一千亿日元，加上中小企业的投资合计约为一万六千亿日元。这些扩大生产的投资，大工厂主要是用于合理化建设，因而在这期间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了近二成到三成左右。因此，生产能力大为增加。虽然劳动生产率提高，工资却几乎没有增长，原料价格也多数下跌。所以，即使不提高产品价格，利润也很大。

由于出口增加，紧缩时剩余下来的滞销货物在海外找到了销路，于是呆货变为现金，厂商得以清偿库存贷款，从而银行的头寸增加了。出口增加，外汇特别会计^①用于购进外汇的资金就要增加。由于农业丰收，粮食管理会计^②对收购大米的贷款支付也增

① 外汇特别会计是日本政府的特别会计之一，专门处理外汇储备、买卖以及外汇交易业务。例如，外汇银行外汇多余时，即将外汇卖给政府以换取日元，在外汇不足时，则以日元向政府购进外汇。出口增加，国库的外汇资金增多，进口增加，日元的卖价就要提高。外汇特别会计就是经理外汇损益的业务。——译者

② 粮食管理会计也是日本政府的特别会计之一，主要经理大米、小麦的收购、销售、分配等业务，以调节主要粮食的供求关系，稳定国民的饮食生活。粮食管理会计分国内大米管理、国内小麦管理、进口饲料的调整等七个帐户。——译者

加了。所有这些都扩大了金融市场上的资金供应。但是另一方面，产业的设备投资并不旺盛，在财政方面，1955年度国家预算的规模与上年一样控制在一万亿日元以内，财政投资贷款增加有限，对大企业的财政贷款甚至比上年缩小。由于资金需求不旺，商业银行不断地将借款归还日本中央银行。1954年8月末日本中央银行的贷款曾达到三千五百六十二亿日元，自1955年10月开始大幅度减少，到同年12月降低到一百七十八亿日元。日本中央银行的信贷规模如此缩小，在战后几乎未曾有过。

随着经济呈现好转，存款大幅度增加，但是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却不活跃，故当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归还借款告一段落之后，便出现了存款过多，以至银行为寻求适当的贷款对象展开激烈竞争的罕见现象。金融的这种呆滞，使长期、短期利率大为降低，由于利率下降和企业利润增加，股票行情大大上升了。

日本经济很顺利地从紧缩向景气转变，其主要原因是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性经济上升带来的出口增加，以及未曾有过的农业丰收的影响。在经济顺利好转的过程中，也多少纠正了战后经济的一些不正常状况。但是，出口的增加是由海外经济上升的外部因素造成的，大丰收主要是天气赐予的。所以日本经济的好转大部分是依靠经济以外的因素。不论从哪方面来说，这时的景气好转和少有的顺利发展不是靠日本经济本身的力量，而主要是依靠外部因素，即所谓偶然因素得来的。诚然，要利用海外经济上升的机会求得自己的发展，就有必要预先扩大设备，进行合理化，进而对中小企业和工人进行整顿。而这种准备工作在1951年以后的发展时期和1954年的紧缩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偶然地完成了。因为原委如此，所以政府当局也在《经济白皮书》中把这种情况写做“不得不说是交了好运”。

2. “已经不是战后了”

1956年的《经济白皮书》在谈到这个时期被称作数量景气的经济发展过程时，用了以下一句话作为结语：“已经不是‘战后’了”。这句话曾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语。它常常成为日本垄断资本夸耀战后重建完成、新的发展即将到来的一种得意之谈。这种自我欣赏，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但是不要忘记，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主要是几次偶然的运气和对外国的依赖以及对中小企业、劳动人民实行剥削的结果。

但是，白皮书中所说的“已经不是战后了”这句话的意思不如说是在于另外一点。因为继这句话之后白皮书又这样写道：“我们现在行将面临不同的情况，即经济恢复阶段已经结束”。就是说，今后的经济增长不会象过去恢复过程时那样比较轻易地进展。在强调这点之后，白皮书便提出以现代化来支持新阶段及在不同情况下的经济增长，并要求人民为此承受相应的负担。这也就是以后要谈到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

白皮书所说的“恢复过程”已经结束的观点就是这样。但是问题在于战后的恢复过程此时已经结束的提法是否正确？不久前出版的经济企划厅编写的《战后经济史》中提出了“经济正常化”的说法。如该书中所说那样，所谓经济正常化，“意味着经济水平已恢复到战前水平，并已突破这个水平”（该书总观篇，第624页）。但是，经济正常化就是恢复到或突破战前水平的说法极难理解。要观察是否恢复到或突破战前水平，就必须把这时期的经济和战前作具体比较。至于用怎样的方法来和战前比较，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在这种场合大体上只能以人们经常使用的代表性指标即按人口平均的实际国民收入来比较。以政府发表的这一指标来看，战前的1934年到1936年的平均数为100，1955年增为

113.3，也就是说，在1955年恢复到并突破了战前水平。为什么以人均实际国民收入额来比较就行，而用别的比如用实际国民收入总额或者其他指标就不行呢？何况工矿业生产指数突破了战前基期年份的水平，而贸易却比战前水平低了许多，与战前的整个水平比较，到底如何看待这一点还是问题。因而如果要作正确和完整的表述，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整个日本经济是在什么时候恢复到战前水平的。于是有人不准备以数字来作战前和战后水平的比较，而离开数字，用另外的观点来判断是恢复时期还是积极发展时期。如果这样来考虑，那么1955年还说不上是属于恢复时期，而是属于日本经济将进入积极发展时期的分界之年。看一下此后第二年即1956年经济上升的过程，大体上就清楚了。

现将以战前为基期的1955年的各种指数列举在第8表上，供大家参考。此表将1955年的人口及其它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与战前的水平作了对比。

第8表 以战前为基期的1955年各项指标的水平
(1934—1936年平均=100)

人 口	129.7	劳 动 生 产 率 指 数	131.3
就 业 人 数	133.5	实 际 国 民 总 投 资 额	154.2
实 际 国 民 收 入 额	139.0	生 产 设 备 总 量	200*
同 上，每 人 平 均	107.1	农 业 生 产 指 数	133.7
（按会 计 年 度 计 算）	113.3	出 口 数 量 指 数	71.6
产 业 活 动 综 合 指 数	187.9	进 口 数 量 指 数	90.1
制 造 业 生 产 指 数	189.4		
（耐 用 器 材	222.6		
（非 耐 用 器 材	168.0		

(备考) *此项是以1935年为100的概数。

从此表看，以达到与战前同等水平的人均实际国民收入为中心，工业生产特别是耐用器材的生产、生产设备总量等都达到了显

著的高水平，唯独进出口特别是出口，很明显地处于低水平。政府发表的实际工资和城市消费水平的指数很有问题，因此在此表中没有列举。如果将表中指数加以修正，估计实际工资指数约为85左右，城市消费水平约为90左右，都比战前水平有所降低。的确，从总体看，超过战前水平的很多，相反地，尚未达到战前水平的是少数，但其意义比较重大，如贸易特别是出口、实际工资和消费水平等重要指标都没有达到战前水平。

3. 向“价格景气”突进

生产扩大和经济增长而没有引起物价高涨，这在资本主义是少有的。生产扩大、经济增长未使贸易收支恶化，在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中更是少有的。因此，象1955年那样经济扩大而物价趋于下降、贸易收支好转的“数量景气”，对日本资本主义来说是绝对罕见的。即使如此，这种趋势也不会长期持续，作为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只要经济扩大和景气上升继续下去，物价便不可避免地要上涨。利率下降也是诱导投资的重要因素。果然，进入1956年后，日本经济就呈现物价上升、进口激增和贸易赤字大幅度增加的趋向。“数量景气”为“价格景气”所替换。

从以上所说的来看，可以说这是当然的演变，但是，与1955年相比，在不同意义上还带来了异乎寻常的结果。根据1956年度开始时政府的预测，该年度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为4.3%，工矿业生产增长率为7.2%，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国民收入增长13.9%，工矿业生产增长23.4%（都是生产指数增长率），实际增长率都比政府的预测高二倍。

诚然，日本国民收入增长率如果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增长率最高的西德、法国比较，已经达到了同等或稍微超过的程度。从实际国民收入对上年的增长率来看，日本1956年约为1950年的

二分之一，与1951年、1952年和1955年几乎相同^①。与1951年的美国、1950年和1955年的西德等增长率高的国家比较，1956年日本的国民收入增长率约低30%左右。的确，从工矿业生产指数的上升率来看，1956年^②日本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上升率最高的法国高一倍，比意大利高一倍半，比西德高二倍，与日本1953年的上升率相同，比1951年的增长率37%低得多。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来看，当时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的上升率连续四年高于1956年的半倍到一倍半，说明该时的景气不论从广度和深度来说，都远远高于1956年。因此，1956年的日本经济高涨，决不是古今东西没有先例的情况。即使在1956年的前一年，日本也有过高速发展的经历。这是交了好运，取得了顺利的发展，到1956年景气进一步直线上升。再从每人平均的实际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指数来看，在从1955年到1956年的经济高涨中，人均实际国民收入超过了过去最高纪录1927年的水平，工业生产指数也超过了1944年的最高水平。也许是从这一点出发，在这一年大肆宣扬“神武景气”^③，散布乐观的气氛。

上年秋季以来有所上升的物价，进入1956年后，发展为全面上涨，领先的是机械、五金等生产资料和资本货物的价格。在上年，生产的扩大是在没有进行大规模新投资的情况下实现的，需求与供给相适应，因而物价没有显著上升。但是这种状况不久就达到极限，“没有通货膨胀的增长”的时期结束了。

基于经济持续增长的期望，生产的扩大从以往的重点——与

① 根据本书统计表9计算，日本国民收入增长率1956年为9.8%，1950年为18.7%，1952年为9.8%，1955年为9.8%。——译者

② 根据本书统计表1计算，1956年日本工业生产增产率为23%，1953年为21%，1951年为37%。——译者

③ 日本传说中的第一代天皇是“神武天皇”，所以“神武”二字在日本有建国初年之义，“神武景气”，即空前繁荣。——译者

出口有关的产业，扩展到投资器材、基础器材等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和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等。其中机械生产部门、特别是船舶（开工量增加 63%）、电机（生产量增加 52%）以及汽车（生产量增加 40%）、普通机械（生产量增加 32%）等生产部门的生产急剧增加。机械生产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扩大的，此后机械生产的大发展也是以此为开端的。造船的开工量也大大增加，接近于上年的一倍。全部机械的生产指数增加了 45%，而且在这一年当中，机械、钢铁两个部门占生产增加部分的五成，化工部门的各种产品占生产增加部分的二成。

如上所述，这样大幅度增加生产，没有设备的补充已不可能，而且生产增加部分的一半以上，是由扩大设备投资所造成的需求带来的。年间的设备投资额达一万二千亿日元，比上年增加了 65%，超过了被称为设备投资景气的 1953 年的半倍。这样，1955 年以增加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在 1956 年便过渡到以设备投资为中心的经济景气。投资重点转到以石油化学工业、电子工业为首的新兴产业和新产品部门，以及以汽车工业的流水作业及其他自动机器为首的设备现代化方面。这一年，正式开始建设石油化学联合企业，所需资金达二千七百亿日元的第二次钢铁生产合理化计划也着手执行。所谓“技术革新”的设备投资时期就是从此时开始的，1957 年以后设备投资进一步扩大。同时，电力、煤炭、钢铁、铁路运输等已告不足，为扩大产业基础，对这些要害部门也增加了投资。

银行对产业扩大投资也持乐观态度，并予以援助，因此信贷激增，银根吃紧，在上年总算趋于消除的超额贷款又大量增加。为此，日本中央银行的贷款再度急剧增加。于是 1955 年作为经济特点之一的经济正常化，很快在一年后发生逆转。

此时，埃及于 7 月实现了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同英、法的对立激化，10 月末，英法终于对埃及开始进行武装侵略。日本垄断资

本也在这场战争中活跃起来，对扩大战争和爆发战争景气寄予很大期望。但是战争刚进行一个星期，英法便不得不停战，于是战争景气、朝鲜景气再来之梦破灭了。

景气暂时出现后退迹象，但是垄断资本预期苏伊士运河因英法军的轰炸而将被长期封闭，于是到年末，便由政府提出积极的预算方针，为下一年度编制“一千亿减税，一千亿财政投资”的预算，垄断资本希望以此强烈地刺激景气。（所谓一千亿财政投资是比上年增加一千亿日元预算，用来刺激景气。）

另一方面，这一年的出口在上年大大增加之后又增加了24%，增长率为世界第一。但是，进口的增长率超过出口，增加了31%。这是由于投资扩大，原材料和生产设备的进口突然增加。入超比上年增加六成，达七亿三千万美元，贸易收支进一步恶化。

4. 农业出现的变化

农地改革在1950年实际上已经结束。从此开始，日本的农业便摆脱了以往的寄生地主制度及其高额地租而进入新的阶段。但是农业仍然是小农经营，生产方法没有立即发生大的变化。

日本农村在战后拥有特别庞大的过剩人口，经过农地改革，已开始部分出现农业生产过剩。道奇路线实行后，生产过剩进一步加剧，农产品价格显著下降，农业户的经济状况恶化。

朝鲜战争爆发后，农业状况因地区和农产品的种类不同而有差别，但一般地说多少有些恢复。政府在1950年8月内阁会议上决定了确立粮食自给的方针，重点放在土地改良和米价政策上，以此谋求粮食的增产。需要确立粮食自给的理由有三：一是战争爆发；一是要节约进口粮食的外汇，以增加出口产业和重工业等的原料的进口；另一是确保以低价稳定地供应粮食，是将来积极发展经济的基础条件之一。

然而，当时的农政常常被称做“三成农政”。这是一种批评性的说法。例如，按当时的农政，交售大米，要以全部农户约六百万户中不到三成的上层农户（约一百六十万）作为确定米价的主要对象，才能保证交售数量；此外，为了增产粮食，在土地改良和米价政策上，也是以这些上层农户作为主要考虑对象，中下层农户只是农政上的一种点缀而已。

诚然，上面列举的粮食增产政策目标，在这一时期并不是一贯的，而且也不是立即生效的。1953年遇上自然灾害，出现了荒年，1954年也是歉收。荒年和歉收为根据MSA小麦协定接受美国的剩余小麦和大麦、接着根据美国的剩余农产品处理法接受美国的农产品（粮食及其他），提供了最好不过的理由。荒年和歉收造成的粮食不足起初并非不存在。但是，1955年以后，粮食不足已明显缓和。无论怎样，美国剩余农产品的最大魅力并不是日本可以借此弄到粮食，而在于剩余农产品在国内销售后获得的日元货款，可以用作财政投资，为垄断资本的设备投资和开发事业提供资金。

由于接受美国这种剩余粮食和通过通常途径进口的粮食增加，尽管1953年国内因灾荒而减少产量，农产品价格仍上升较少（参看后附第9表）。因粮食生产不足而粮食价格高涨的现象，就是在这灾荒年份也没有发生。

米价和与此有关的主食的统制，在这时期发生了相当大的质的变化。对主食的统制政策，从战时一直延续到战后，目的是在粮食不足时，也可保证最低限度的供应量；同时，低价政策可以抑制粮食供应价格的上升，从而防止因粮食不足和价格暴涨而引起的社会混乱，其最终目的是避免提高工人工资，以确保垄断资本的利润和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以这个意义来看，主食的统制政策有很重要的作用。只是由于执政的自由党以前有过完全撤消统制的口头许诺，所以在欢迎撤消统制和实行自由经济的气氛中，于

1950年3月简单地决定了对主食撤消统制和自由贩卖的方针。但是，它遭到了在野党各派的强烈反对，在人民群众中间反对的呼声也很强烈。

由于国家管理粮食或统制主食，使政府增加了巨额的财政负担，因而出现了撤消对主食的统制以减轻这项财政负担的要求。当时在垄断资本中，这种要求很强，后来池田财政大臣提出的坚决主张也反映了这种要求。农林当局对此却持慎重态度并加以反对，一向主张自由贩卖大米的农民也表示反对。尽管如此，1951年10月3日政府还是公布从次年1952年1月1日起撤消对大米的统制。但是，后来在11月1日池田财政大臣为编制追加预算而与道奇会谈时，因撤消大米统制牵涉到追加预算，能否撤消统制就成了问题。道奇担心撤消大米统制会破坏低米价、低工资的基调，发生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危险，持强烈反对态度。于是政府于11月6日立即发表声明，废除撤消主食统制的方针。接着，经济企划厅在《战后经济史》(经济政策篇)中写道：“当然是道奇的慎重论发挥了有力的作用”(参看该书第287页)。

1952年6月，撤消了对小麦的统制，接着，对大米实行了“完成交售任务后自由上市制”。从根本上说，这几乎未使一向实行的大米统制发生什么变化。重要的是，虽然大米统制照样继续执行，但是它的作用从这时起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历来强烈反对强制以低价交售大米的统制制度，一直要求撤消这种制度。但是，1951年秋在政府公布撤消米麦统制时，全国农民却举行大会，反对撤消这个统制。当时农业方面反对撤消统制是基于农协^①等的立场——

^① 农协，全称“农业协同组合”，是根据1947年的法律规定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农业合作组织，主要工作是在生产、贩卖、采购、技术、经营、信贷等方面为农民提供服务。全国农协分三级组织，即单位农协(基层组织)，都、道、府、县农协联合会，全国农协联合会。——译者

反对难以对付的竞争对手即商业资本向农村的扩张。但是，撤消小麦统制之后，得自美国的剩余农产品和其它粮食的进口都有增加，而 1955 年又是创纪录的丰收年，农产品普遍地大幅度增产。到这时候，大米的供求和价格也逐渐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从 1953 年起，大米交售量已超过了政府规定的指标。前面已经谈到，尽管 1953 年还是荒年，大米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仍仅有微上升。政府管理的大米储存量在 1954 年度特别是在 1956 年度显著增加，黑市米价在 1953 年涨至高点后就明显地降低了（参看第 9 表）。从粮食厅 1955 年 12 月发表的数字看，无论在产地还是在消费地区，大米的黑市价格还稍稍低于配给的价格。特别是在产地，大米配给制广泛地取消了。

第 9 表 大米供求缓和及黑市米价的降低

	1952年度	1953年度	1954年度	1955年度	1956年度
政府管理的大米 (存货量，单位：千吨)	1,260.0	1,514.0	1,514.0	1,406.0	2,535.0
黑市米价的指数 (1951年度=100)	108.9	129.8	123.9	116.2	106.0

（备考）根据农林省资料。

黑市米价的降低，对于一向依靠黑市大米收入来弥补经济亏空的大多数农户来说是很大的打击。不仅如此，由于黑市或自由价格低于配给价格，一旦撤消大米统制，农民就不得不担心又发生压价收购大米的情况。因而，此时农民离开了原来的立场，反对撤消大米统制。同时，政府和垄断资本在决定 1956 年度大米的收购价格时，虽曾以丰收为理由加以压低，但对于大米统制本身，不得不将重点从原来的确保粮食供应的目的转到农民强烈要求的支持价格上来，使统制继续保存下来。为了维持保守政权，它们不能无视地域广阔的农村的这个要求；同时，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发生不测而导致

致米价显著上升，为抑制米价上涨，还是守住大米统制这一隘口为好。这样，大米统制的主要目的便由确保供应逐渐转到支持大米价格上来，政府除收购、保管、投放及控制产地价格和配给价格外，继续维持作为直接统制的大米配给制度。

然而，经过 1953 年的荒年和 1954 年的歉收之后，到 1955 年，大米生产剧增 36%，获得了创纪录的丰收，除麦类和水果以外，其他农畜产品也普遍获得大幅度的增产。增产主要是风调雨顺的结果，但是从其后每年的收获情况来看，大部分农产品都恢复到 1954 年以前的产量水平，而且不管天气如何，都维持在比 1955 年高得多的水平上。

日本的农产品特别是大米的产量，1955 年起突然大幅度地上升。这是农地改革的结果，也是 1950 年开始的以土地改良和价格政策为支柱的粮食增产政策以及农业技术进步的反应，这些效应借摆脱荒年和歉收的机会，一下子都表现出来了。除大米以外，商品性的农产品特别是牛奶、猪、鸡、鸡蛋等畜产品，从 1955 年之前起到这之后都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商品性的农产品和畜产品生产大幅度增加后不久，多数出现了过剩的倾向，价格水平也趋于下降。

对此，1958 年度的《经济白皮书》写道：“这些农产品的消费水平现在还是低的，在低水平的情况下，出现了过剩的倾向”，而且指出日本的农业是过度的小农经营，这就很难调节生产，“这种过度的小农经营，本身就具有助长生产过剩并难以调节的性质。”（1958 年《经济白皮书》，第 198、199 页，括号内是作者所作的补充）

可以认为，在农畜产品过剩倾向的背后确有这样的因素在起作用。农地改革也没有改变日本的小农经营和耕地分散的现象，关于这一点，除白皮书指出的以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需要补充说明。这就是小农经营妨碍以生产的现代化来降低生产费用，从而妨碍了消费的大幅度增长，这又进一步加强了过剩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对大米以及大豆、淀粉、菜籽、蚕茧等采取的某种程度的价格支持制度，在丰收、大幅度增产、生产过剩的情况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大米，在1955年或以后的丰收时，价格支持制度发生了相当显著的效果，政府的收购价格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普遍有些提高，没有发生丰收贫穷和丰收饥饿的现象，而且对景气上升也产生了好的影响。因此，垄断资本撤消大米统制的要求越来越受到农民的强烈反对。不过，不能忽视的是，价格支持制度一直在扩大国家的财政支出，而且也丝毫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的倾向，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如上所述，1951年，池田财政大臣曾为垄断资本谋求实现的撤消大米统制作过很大努力，只是由于道奇的干预，在行将实行之前停止了。此后约四年，自民党经由保守合流而诞生，该党内阁中的农业大臣河野远比过去历代农业大臣强硬，并露骨地站在垄断资本的立场上推行农业政策。这就是所谓的“河野农政”。他顽强地执行垄断资本对农业的要求。最重要的是，为撤消大米统制作了不同寻常的努力。尽管如此，由于农民强烈反对和保守阵营内部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矛盾，撤消大米统制仍旧难以实现。

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日本农业尽管受到农产品消费水平低和过度的小农经营的制约，但在这一时期总算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可是，它的发展速度、水平和规模与其他产业特别是急剧发展的工业和建筑业根本不能相比。换言之，在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农业的发展是极端落后的。不仅如此，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急剧发展，农业反而受到强烈的冲击。农民的分化进一步加剧，进而农业的发展也受到制约。关于这个问题，后面再作叙述，这里先稍为谈一下这一时期的前半期已明显暴露出来的专业农户减少和兼业农户急剧增加的问题。

日本在战后膨胀起来的农业人口，到1949年已停止增势，至

迟从 1954 年起便转入减少时期。这当然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以工业为中心的各种产业急剧扩大所带来的强大影响。农户总数也以 1949 年的六百二十五万户为最高，其后一直到 1955 年，几乎是每年减少。从农户总数的变化中可以看到，专业农户在 1950 年前就开始出现减少的倾向，1950 年专业农户和兼业农户的比例还各占 50%，几乎彼此相等，以后专业农户便不断减少，而兼业农户每年都趋于增加，到 1955 年时，专业和兼业的比例是 35% 对 65%，兼业农户约占全部农户的三分之二。至此为止，兼业农户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经营规模过小，要以非农业收入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或者是自己从事的工作工资收入不足，要以农业收入来补充。

进入 1955 年后，专业户微减，兼业户微增，农户总数也很少增加。但是从兼业农户来看，第一种兼业农户和第二种兼业农户在 1950 年和 1955 年期间都有增加，而 1955 年以后则变为第一种兼业农户趋于减少，第二种兼业农户趋于增加。（参看第 10 表。所谓兼业农户即家属中有人从事其它职业的农户。第一种兼业农户，是指以农业为主的兼业农户；第二种兼业农户，是指以农业为辅的兼业农户。）第二种兼业农户虽说包括在农户当中，但不能说是正经的农户。这种农户后来在 1960 年约占整个兼业农户的半数。从统计上可以看到，在 1955 年和 1960 年期间农户总数增加得很少（从六百零四万三千户增加到六百零五万七千户），但农业人口减少的倾向停止了。实际上，因为不能称为农户的“农户”增加了，在 1960 年这样的“农户”中专业农户和第一种兼业农户的户数相等。实际上正式农户从 1955 年到 1960 年减少了约三十万户，因此 1960 年约六百零六万农户中算得上农户的户数大体上约占三分之二，比 1947 年约减少二百万户。

总之，从农业就业人数连续减少的趋向看，在农户数上，1955

第10表 农户总数及专业农户和兼业农户数的变化

	农户总数	专业农户数	兼业农户数			(单位：千户)
			总数	第一种兼业	第二种兼业	
1947年	5,909	3,274	2,636	1,678	951	
1950年	6,176	3,086	3,090	1,753	1,337	
1955年	6,043	2,105	3,938	2,275	1,663	
1960年	6,057	2,078	3,978	2,036	1,942	

(2) 构成比						
1947年	100.0	55.4	44.6	28.5	16.1	
1950年	100.0	50.0	50.0	28.4	21.6	
1955年	100.0	34.8	65.2	37.7	27.5	
1960年	100.0	34.3	65.7	33.6	32.1	

注：1. 本表系据农林省统计调查部的资料制成。

2. 不包括冲绳。

3. 1947年系当年8月1日数字，其余年份均系当年2月1日数字。

年前是专业农户趋于减少、兼业农户趋于增加，而1955年以后则是专业农户减少的趋向放慢，兼业农户脱离农业的趋向在发展。这种变化是值得注意的。

5. 垄断的加强和对外关系

代替吉田内阁的鸠山内阁刚一登台，就打出“完成独立”、同全世界各国进行“独立自主的外交”的旗号，迅速同苏联进行恢复邦交的谈判。但是进行这项谈判实在极其困难。与此同时，日中贸易在朝鲜战争时被美国禁止以后，通过缔结民间形式的第一次贸易协定(1952年6月)、第二次贸易协定(1953年10月)，在美日两国政府的禁运政策下，仍旧有所恢复，日苏谈判开始后不久，于1955年5月签订了第三次日中贸易协定，至此，政府总算给予了间接的保证。日中贸易尽管受到日本政府及在它背后的美国方面的

严重阻挠，但还是大幅度增加了，进出口合计 1955 年超过了一亿美元，1956 年达到一亿五千万美元。日苏恢复邦交虽有曲折，但也于 1956 年 10 月实现了，1957 年两国正式建立了通商关系。日苏间的外交、经济关系和日中贸易关系的某种改善，是解除占领后、吉田内阁下台前后日本垄断资本的一项方针，或者是一部分人的方针。

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日本于 1952 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后，又于 1955 年 9 月加入了关税贸易总协定，1956 年 12 月加入了联合国。

这样，由鸠山内阁提出的“完成独立”、“自主外交”的路线，在冷战暂时缓和、国内经济好转以及随之而来的垄断资本加强的情况下，逐步取得了进展。同时，在对美关系上，日本政府由于国内的景气和丰收，曾谢绝第四次接受剩余农产品的协定。但是，随着防卫责任的增加，美国强硬要求日本承担义务的压力，在鸠山内阁加紧重整军备的配合下，已把日本深深地纳入了美国的远东战略体系。当然，日本对美从属关系的根本不是在这届内阁才确定的，而是在占领时期、吉田内阁时期早已确定了的。

另一方面，迎来了真正发展时期的日本垄断资本，开始热衷于向海外扩张。在国内，垄断资本还以其强大压力实现了保守联合；病弱的鸠山首相于 1956 年末下台之后，石桥内阁代之而起。此后不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出现了重要的变化。